

## 論學者治學

### 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態度

陳珮穎\*

#### 一、前言

徐復觀先生，原名秉常，字佛觀，後由其師熊十力更名為復觀。湖北浠水縣徐培場鳳形灣人。生於 1903 年，卒於 1982 年。1955 年執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，1969 年退休，轉赴香港，執教於新亞書院(後併入香港中文大學)。一生研究領域廣泛，橫跨政治社會、史學、哲學、藝術、文化……等領域，給予後人在學問研究上良好的啟發。

作為新儒家第二代重要的代表人物，新儒家面臨五四以來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，在中國救亡圖存的風氣下，以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為理念，期望在環境劇變的時代裡得以安身立命、安頓心靈。徐復觀先生企圖從中國歷史的流變之中，培養洞悉的眼光省察歷史的發展，同時積極的為中國尋找一條合理的道路。他在《中國人性論史·先秦篇》寫道：

可以透過一人的性，一個人的心，以看出人類的命運，掌握人類的命運，解決人類的命運。<sup>1</sup>

我們得以在近人研究他的論文篇章中，見研究者們體察先生精神內部的「憂患意識」。徐復觀先生自己也曾寫道：

憂患意識的出現，乃是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慮而來的遠見，在這種遠見中，主要發現了吉凶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係，即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。所以憂患意識，乃是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，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。<sup>2</sup>

其研究周代所體察的精神，一併影響他的處世態度。另外，在〈徐復觀的考據觀和考據方法述論〉一文中亦形容：

徐復觀在考證問題時特別注意史家與時代經驗、意識的互動。……強烈的時代批判意識，個人現實經驗的介入與治學的政治關懷素求相結合，使他在研究問題時較多注重時代經驗的啟發，故其著述充滿著時代的投影。<sup>3</sup>

---

\*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

<sup>1</sup> 見頁 114，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，2002。

<sup>2</sup> 見《中國人性論史·先秦篇》，頁 14，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，2002。

<sup>3</sup> 邵華、陳勇撰，見《江海學刊》，第 6 期，2014 年 12 月，頁 183。

他以「感憤之心」投入研究，除了學術上取得的成果，更注重將精神帶入現實生活中實踐。他的精神能夠讓後面的學子們效法學習，讓學問走進生命，不把自己關在研究的象牙塔之中。

本學期承蒙中文系阮美慧主任的引薦，和系內學長及學弟妹們共同協助東海圖館進行徐復觀先生的資料、文獻整理。有幸受圖書館特藏室謝鶯興老師指導，就其著作、期刊、論文，以及近人研究徐復觀先生的部分，著手整理進而匯集成目錄，再細分他人研究中，有關其「治學」方面的研究，以此些篇目內容為基底，歸納整理出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態度與方法供讀者參考，進而精進自己的治學方法、對照自我的學習態度、省思求學路途中貫徹始終的目的何在。

## 二、治學態度

治學的態度與方法，其關連性密不可分。關於兩者，徐復觀先生曾提出自己的幾個重要的觀念。首先，治學的態度比治學的方法更重要。「決定如何處理材料的是方法；但決定運用方法的則是研究者的態度。」<sup>4</sup>指出研究者的心態將導向研究者選擇什麼樣的方法做研究。其次，就研究方法的層面來看，徐復觀先生十分重視學術研究的方法，提出：

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對象所提出的要求，及研究對象向研究者所呈現的答覆，綜合在一起的一種處理過程。所以真正的方法，是與被研究的對象不可分的。<sup>5</sup>

方法好比一張濾紙，濾紙的材質、間隙的大小，各方因素都會決定過濾後得出的材料面貌。第三：

學術方法是出自治學歷程中所蓄積的經驗的反省。由反省所集結出的方法，又可以導引治學中的操作過程。……方法真正的作用，乃發生於誠摯的治學精神與勤勉的治學工作之中。方法的效果是與治學的工力成正比的。<sup>6</sup>

方法與反覆地實踐是相輔相成的，從而點出隨著經驗的積累，對於使用方法的掌握度將愈趨成熟穩重，並逐漸積澱深厚。

接下來筆者將從數篇研究徐復觀先生治學方法的期刊論文中，歸類整理

---

<sup>4</sup> 見〈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〉，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，台灣學生書局，1993，頁4。

<sup>5</sup> 同上註，頁2。

<sup>6</sup> 徐復觀，〈我的若干斷想〉，出自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，台灣學生，1975，第2-3頁。

出幾項徐先生治學的態度：

(一)追體驗--和古人對話

「他在承認歷史是不斷進步的同時，卻也承認歷史之中有著永恆不變的常道。這一常道就是儒家的內聖之學、心性之學。」<sup>7</sup>在此情況下，必須要透徹了解原典及古人思想的內涵，就「追體驗」的字面來看，意旨「體驗」作品背後創作人的心靈活躍狀態；「追」即回溯、反觀，表示將以自己的身心全神貫注地深入作品背後的精神要旨，甚至投入創作者的生命歷程及靈魂進行對話。

徐復觀先生在〈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〉<sup>8</sup>中說明自己身為一解讀者，更要以生命去貼近生命：

由古人之書，以發見其抽象思想後，更要由此抽象的思想以見到在此思想後面活生生的人；看到此人精神成長的過程，到此人性情所得的陶養，看到此人在縱的方面所得的傳承，看到此人在橫的方面所吸取的時代。……。治思想史的人，先由文字實物的具體，以走向思想的抽象，再由思想的抽象，以走向人生、時代的具體。經過此種層層研究，然後其人其書，將重新活躍於我們的心目之上，活躍於我們時代之中。我們不僅是在讀古人的書，而是在與古人對話。

以心見心，若是沒有自我的存在，亦沒有所謂的感受與共鳴，也沒有對話的可能。

「以自己的心靈契合藝術家創作時的心靈活動狀態。這個追的過程對於欣賞者而言無疑是一種體驗，是對藝術家的生命體驗的再體驗，是體他人之驗，感受他人對生命的體驗。」<sup>9</sup>從這一步開始，才能進一步做到知人論世，意指從一個人的性格、思想、遭遇推論出其身處的時代文化，再進一步推測出一個時代的面貌，將時代放在歷史中見其流變的軌跡，由小而見大。

(二)居敬之心

分為兩方面分析，第一是根源問題，唯有回歸自身民族的文化裡，人才有可能回到本質，所以要對自己的文化抱持「居敬」的態度。第二是以「敬」的態度為本，治學過程中秉持客觀及誠敬的心。

---

<sup>7</sup> 呂鵬，〈徐復觀歷史觀的基本特徵〉，《齊魯學刊》，第6期，2011年7月，頁57。

<sup>8</sup> 見徐復觀〈有關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問題〉，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，台灣學生，1975，頁116。

<sup>9</sup> 郭慧，〈貫通文化生命的現代疏釋：徐復觀治中國思想史的態度與方法〉，《長春理工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6期，2009年7月，頁909。

徐復觀先生曾言：「要知道，在祖國裡沒有我們的立足地，便在世界上任何地方，也沒有我們的立足地。」<sup>10</sup>只有在「對歷史文化採取無限的敬意的態度，只有在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中，個人的生命才是有根基的，才能得到充分的展開。那些惟西方文化是從、惟西方信仰是信的人們，他們的生命是飄忽的，終不會有活力，不能長久。」<sup>11</sup>這是徐先生在歲月的歷練中，回過頭重新拾起年輕時學習的種種，綜合時代背景的氛圍，所得到的省思。

對待學問以敬的態度、以客觀的角度解讀之，特別是在人文思想領域，指出研究的對象與研究者的生活態度是密切相關的，且現實生活中的態度常常會直接干涉到研究時的態度。他在〈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〉裡說道：

要是我們的現實生活態度能適合於研究時的態度，最低限度，不太干涉到研究時的態度，這恐怕研究者須要對自己的生活習性有一種高度的自覺；而這種自覺的工夫，在中國傳統中即稱之為「敬」。……求知最基本的要求，首先是要對於研究對象作客觀認定；並在研究過程中，隨對象的轉折而轉折，以窮究其自身所含的構造。<sup>12</sup>

研究者在學習過程中，透過「我」的角度解讀文本，不小心將自我膨脹化，本末倒置的以文本中的思想為輔，自己的思想為主，殊不知文本中的思想與自己的見解還有段距離。透過「居敬」的態度，時刻提醒自己是否主觀的去詮釋他人的思想內容，將古人的思想和研究者的思想分開，才不會反客為主，這也是對學問的莊敬。

(三)吸收中國文化原有的思想研究方法，也吸取西方哲學的方法

徐復觀先生以犀利的目光，將時代置歷史流變中，洞察靜變之間的循環交替，得出：

知識與技術，也就是物質層次，可以而且應當使用進步的觀念，當屬進步之物；但對宗教與道德而言，也就是屬於價值層次的事物，很明顯的便不適用進步的觀念，此即永恆之物。<sup>13</sup>

以過去為借鑑，站在現時的立足點上，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問題，將傳統思想置放於具體地時代語境中解釋，這是徐復觀先生投入學術的重要核心

<sup>10</sup> 見〈考據與義理之爭的插曲〉，《中國學術精神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，頁155。

<sup>11</sup> 郭慧，〈貫通文化生命的現代疏釋：徐復觀治中國思想史的態度與方法〉，《長春理工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，第6期，2009年7月，頁909。

<sup>12</sup> 見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，台灣學生書局，1993，頁5。

<sup>13</sup> 呂鵬，〈徐復觀歷史觀的基本特徵〉，《齊魯學刊》，第6期，2011年7月，頁57。

精神所在。套句杜維明教授過去在「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」中的一小段話：

表面上看，他是為孔孟之道據理陳詞，露骨地說呢，他要打抱不平，他要為傳統中國文化伸冤。其實更正面的看，是一個怎樣重新再鑄民族魂的工作。<sup>14</sup>

追體驗的態度，除了運用於了解古人的思想上，從其書、其人至其時代的拓展之外，在研究的方法上，以所屬時代的思維脈絡思考，並以其運用的方式來研究材料，方能更還原材料本來的內涵。正如徐先生說過：「我們研究宋明理學，我們不依用宋儒所以得出某種結論的方法，你如何了解它？」<sup>15</sup>

關於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情況，他提出最重要的根本在於思考力，這同時是一般知識份子最缺乏的能力。徐先生將自己的頭腦比擬作一把刀；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一塊砥石。

我們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來分解我國思想史的材料，順著材料中的條理來構成系統；但並不要搭上西方某種哲學的架子來安排我們的材料。我們與西方的比較研究是兩種不同的劇場，兩種不同的演出相互間的比較研究，而不是我們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裝，用上他們的道具比較研究。<sup>16</sup>

藉由了解西方哲學的理論架構來培養思考能力，以此能力將中國哲學分解、吸收，將內在的核心精神濃縮、提煉出，是研究思想史的一項重要的任務，也是治學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能力。

(四)研究原典時考據義理同等重要--由局部衡定全體，全體回歸局部

民國以來，以胡適為首的新派學人，力圖以西方思想革新時代的情況下，多將改革的矛頭指向中國的傳統文化，並套上「陳舊過時」的形容詞，這與新儒家的立場有所不同，新儒家學人反對將傳統典籍當作材料處理，不帶任何文化情感，且忽略道德宗旨。

徐復觀先生認為現代學術典範，其對於科學方法的認知範疇，割裂了事實求真與價值致用的聯繫，忽視了人文學科求知過程中史家價值主

---

<sup>14</sup> 見〈徐復觀先生的人格風範〉，收錄於《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，東海大學主辦，1992年12月，頁21。

<sup>15</sup> 見〈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論考據與義理〉，《中國學術精神》，上海華東師範，2004，頁131。

<sup>16</sup> 見〈我的若干斷想〉，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，台灣學生，1975，第2頁。

觀判斷的存在。他們的科學考據所尋求的絕對客觀的解釋，將考據引向點滴的文獻尊崇立場上，以標榜所謂科學的口號開始，以不科學、反科學的收穫告終，違背了古典思想自身所具有的脈絡結構和語境體驗，無法深入和觸及到古典思想性問題的討論中。<sup>17</sup>

在研究思想史上，考據和義理應立於平等地位而不可偏廢，兩者同樣是環環相扣的。

徐復觀先生強調有價值、有思想性的考據，考據應建立在史料可信的基礎上，一字一句為憑藉，文意可從前、後推敲，或從旁人的典籍中相呼應之處著手，可用歸納的方法，切忌空談。舉他曾在〈評訓詁學上的演繹法--答日本加藤常賢博士書〉中提及的方式為例：

對於某一字詞的解釋，由它的上下文來加以決定；只能從一個人的思想，從一部書的內容，用歸納的方法來加以決定。用歸納的方法決定了內容以後，再由內容的涵蓋性，以探索其思想的內在關聯。由內容與內容的比較，以探索各思想相互間的同異。歸納的材料愈多，歸納的愈精密，我們所得出的結論的正確性愈大。<sup>18</sup>

考據是研究的最初工夫，後涉及義理的研究工作。

我們所讀的古人書，積字成句，應由各字以通一句之義；積句成章，應由各句以通一章之義；積章成書，應由各章以通一書之義。此為由局部以積累到全體的工作。在這一步工作中，用得上清人所謂訓詁考據之學。……但這是起碼的了解。要進一步瞭解，更須反轉過來，由全體來確定局部的意義；即是由一句而確定一字之義，由一章而確定一句之義，由一書而確定一章之義，由一家的思想而確定一書之義。這是由全體以衡定局部的工作。此為工作的第二部，便非清人訓詁考據之學所能概括的的工作。……由局部累積到整體，由全體落實到局部，反覆印證，才是治思想史的可靠方法。<sup>19</sup>

初見文獻材料時，需從訓詁考據確立文獻的可信度，如果只停留在這一步，是無法更深的了解至思想層面的，故下一步針對義理的闡釋，自點、線、

<sup>17</sup> 邵華、陳勇，〈徐復觀的考據觀和考據方法述論〉，《江海學刊》，第6期，2014年12月，頁179。

<sup>18</sup> 見《中國學術精神》，上海華東師範，2004，頁182-183。

<sup>19</sup> 見徐復觀〈有關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問題〉，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，台灣學生，1975，頁113-116。

面拓展出去，把握全面的要旨，再回頭從細節處著手，如此往返，是把握原典內涵的關鍵。

(五)事實求是，多作反省

東海中文系吳福助教授的〈從《史記札記》看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方法〉<sup>20</sup>中，寫道徐復觀先生研究《史記》的態度，講究版本之外，亦會於閱讀當中「分段落、尋文脈」，提撮段落大意以掌握全篇的跌宕起伏，他在一生的學術研究工作裡頭，最重視考據的工夫，從基本材料入手，讓基本資料自己講話，以歸納的方法從全書抽出結論，在細讀全書時，要將訓詁、校勘、版本的問題涵蓋其中。他說：

我不信任沒有細讀全書的抽樣工作，更痛恨斷章取義，信口雌黃的時代風氣。<sup>21</sup>

另外，他也重視研究中的誠實態度，除了將意見相同的材料加以考察，亦考察意見相左的材料。舉徐復觀先生〈由潘重規先生〈紅樓夢的發端〉略論學問的研究態度〉來說：

徐復觀認為，潘重規研究態度的不誠實主要表現在兩方面：一是抹殺重要的與他的預定意見相反的材料；二是對不足以支持他預定意見的材料，則通過附會歪曲的方法強為其預定結論做證明。<sup>22</sup>

由此可見其做學問過程中採取實事求是的原則、嚴格客觀的批判態度，絕不輕易信服盲從。

除了實事求是的態度，徐復觀先生還有一項值得眾人效仿的--反省與接納他人意見的態度。我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。在成功大學中文系唐亦男教授〈從討論「慎到之道」看徐先生的治學精神〉的文章裡，曾提及一段：

與徐先生討論最大的啓發不是接受他的意見，而是在方法上的共識，就是以思想觀念為主要的研究方法，所以儘管對我的看法不認同，但卻嘉許說：「你講的也有道理」。<sup>23</sup>

第二個例子是，徐復觀先生在《由〈尚書·甘誓〉〈洪範〉諸篇的考證看

<sup>20</sup> 見《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，東海大學主辦，1992年12月。

<sup>21</sup> 見徐復觀〈中國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據問題 代序〉，收錄於《兩漢思想史》卷三，台灣學生書局，1979，頁4。

<sup>22</sup> 見〈從學術上搶救青年一代：徐復觀論治學的態度〉，劉國民，《中國青年研究》，第2期，2016年，頁34。

<sup>23</sup> 同註20。

有關治學的方法和態度問題--敬答屈萬里先生》一文中說：

屈先生引用「實事求是，莫作調人」兩句話，以表明他的治學態度。在我看「實事求是」這一句話是好的。「莫作調人」這句話卻被許多人利用作為「固執己非」的壯膽劑，並做為應用一剖兩開的二分法的辯護人，卻常發生很壞的影響，……若屈先生所引的兩句話改為：「實事求是，多多反省」，是否對肯用心做學問的人更有點幫助呢？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經驗：即是自己在某一時期覺得是從實事上求得了「是」，假定隨時日之經過而學問有了進步，或有了新材料的出現，便會不一定再覺其為「是」的。在此種情形之下，有反省力的人，便由對自己過去的某些結論的否定而前進了，固執己非而自矜為「莫作調人」的人，便常花費寶貴的歲月，為自己過去的錯誤做辯護的工作，這是非常可惜的。<sup>24</sup>

這兩個例子可貼切的明白徐復觀先生擇善固執，卻不一味固執己見，用謙虛的態度接受他人的想法，並抱持多多反省的態度檢視自己的研究，著實難得。

### 三、結論

以上列舉的五項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態度，是從近人研究的期刊論文中歸納整理出來的。從接手目錄整理這份工作開始，對徐復觀先生的研究有進一步的了解，知悉其在各方領域的貢獻，同時對東海早期的先生們，包括蕭繼宗先生、牟宗三先生、徐復觀先生……等有更多的欽佩，因為他們是如此地致力於研究學問，並努力地想解決時代的問題。從近人研究的資料來看，我們會發現：徐復觀先生做研究時有邊閱讀邊寫眉批的習慣，並且講究通讀原典，以摘抄的方式學習，他說這是最「笨重」的工夫，卻在他一生讀書過程中受益良多。由此可見，徐復觀先生是位扎實做學問的人。

特別是在整理旁人對他治學態度的研究資料時，身為一位協助整理的人，我著實受益匪淺，從中體認到做學問時的嚴謹態度，以及裡頭包含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。從他的治學方式可推測出其為人處世的那一面。而身為一位中文人，我不僅從中汲取適用於未來研究之路的方法與態度。關於做學問，治學態度與方法就像開啟學問之門的鑰匙，必須使用對的鑰匙方能有助於學習。也希望未來在研究領域的人們，了解徐復觀先生的著作思想的同時，也能留意其治學的方式，從中效法所欣賞的那一部份，有助於學問的精進。

<sup>24</sup> 見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，台灣學生書局，1993，頁143。

#### 四、參考資料

1. 〈徐復觀的讀書方法〉，孟祥海，《學習博覽》，第 11 期，2014 年。
2. 〈徐復觀的考據觀和考據方法述論〉，邵華、陳勇，《江海學刊》，第 6 期，2014 年 12 月，頁 178-184。
3. 〈從學術上搶救青年一代：徐復觀論治學的態度〉，劉國民，《中國青年研究》，第 2 期，2016 年。
4. 〈徐復觀的思想史方法論及其實踐〉，黃俊傑，收錄於《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，東海大學主辦，1992 年 12 月，頁 251-281。
5. 〈從《史記筭記》看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方法〉，吳福助，收錄於《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，東海大學主辦，1992 年 12 月，頁 327-423。
6. 〈評徐復觀的學術態度與學術方法〉，顏炳罡，《孔子研究》，第 3 期，1997 年 9 月，頁 49-60。(後收錄於《徐復觀與中國文化》一書)
7. 〈淺析徐復觀的讀書思想〉，邢康、劉維生，《中國包裝科技博覽》，第 21 期，2008 年 7 月，頁 110-111。
8. 〈貫通文化生命的現代疏釋：徐復觀治中國思想史的態度與方法〉，郭慧，《長春理工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，第 6 期，2009 年 7 月，頁 908-910。
9. 〈徐復觀歷史觀的基本特徵〉，呂鵬，《齊魯學刊》，第 6 期，2011 年 7 月，頁 57-60。
10. 〈徐復觀詮釋傳統藝術精神的基本方法〉，邵華、陳勇，《南陽師範學院學報》，第 8 期，2012 年 7 月，頁 1-4+10。
11. 〈從討論「慎到之道」看徐先生的治學精神〉，唐亦男，收錄於《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，東海大學主辦，1992 年 12 月，頁 117-132。
12. 〈徐復觀的工夫理論〉，謝永鑫，《武漢大學學報(人文科學版)》，第 58 卷第 3 期，2005 年 5 月，頁 266-272。
13. 〈徐復觀的工夫理論〉，謝永鑫，《武漢大學學報(人文科學版)》，第 3 期，2005 年 7 月，頁 266-272。
14. 〈徐復觀先生的人格風範〉，杜維明，收錄於《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，東海大學主辦，1992 年 12 月，頁 15-28。